

21

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

2007

报告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1世紀每度報告文學選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7 报告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 - 7 - 02 - 006512 - 7

I .2… II .人… III .报告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4747 号

特约编辑:李炳银 责任编辑:侯群雄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李 博

**2007 报告文学**

**2007 Bao Gao Wen Xue**

---

**人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69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9.625 插页 2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512 - 7

定价 34.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 版 说 明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社曾编辑出版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年选本,其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进入新的世纪,我社陆续恢复编辑出版短篇小说年选、中篇小说年选、散文年选,对当年我国中短篇小说及散文创作实绩进行梳理、总结,向读者集中推荐,取得了良好效果,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了贡献。

报告文学敏锐及时地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生活。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同时与小说年选、散文年选形成系列,我社又恢复编辑出版报告文学年选,于次年元月出版;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我们希望年度报告文学选能够反映当年报告文学的创作概况,使读者集中阅读欣赏当年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 目 录

他与我在一起直至永远 ..... 章含之 1

我一直幻想着这样一种婚礼，在神圣的主的面前，两个人面对面，心对心，说出庄严的誓言：“我章含之愿意与乔冠华结为夫妻，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

王凤英：悲情《三十里铺》 ..... 施雪钧 66

蓝天、黄土、高坡、黄水以及陕北老区那特有的苍凉，不但构筑出中国民族音乐史上一个伟大的乐府，而且养育出伟大而淳朴的人民。

田凤山：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 ..... 泽 津 77

从高官到罪犯，从天堂到地狱，田凤山到底如何铸就他的畸形人生？他那令人震惊的犯罪轨迹，给世人留下多少回味与思索？

草根民主与共和国大法 ..... 王布衣 126

1980年春天，广西河池合寨村的蒙宝亮、蒙光新、韦焕能、蒙成顺等20多位壮族农民，为了保护集体和个人财产，站出来维护当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组织村民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敲响了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开场锣鼓。

中国申奥亲历记

——两次申奥背后的故事 ..... 孙大光 240

到处是中国国旗，到处都是一片红……

莫斯科沸腾了！

世界沸腾了！

这一刻属于北京！

这一刻属于中国！

三峡“石头女” ..... 何建明 367

渐渐，我又感觉那“中国石”三个字变成了“中—国一心”。

是我的泪水模糊了眼睛？还是奇石真的显奇？

呵，我终于明白了，什么都不是，是我们的百万三峡移民们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赤子之情在感动着我……

香港回归祖国 10 周年回眸 ..... 长江 378

10 年前中国对世界没有许下一句大话；10 年后，香港在国

际舞台上依然靓丽、丰满、端庄、自信，而且前途更不可限量。至

此中国人更是无须张扬了，因为此时，几乎所有疑惑的嘴巴都已  
经放弃发问。

秘境

——中国当代玉市考录 ..... 白描 420

商业这个巨大的魔掌，正在中国营造一个轰轰烈烈的玉市。

异乡客：生存之道

——勇闯上海的台湾文化人侧记 ..... 傅宁军 507

他们生长于海峡彼岸，与你我一样是中国人，只不过揣着一  
张台胞证……在人才济济、竞争白热化的上海，生存远非一个  
“饭碗”的概念可以囊括。

他们凭什么本事“抢滩”？

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

——《天使在作战》续篇 ..... 朱晓军 548

面对医疗界监管曾经失控、腐败猖獗、患者遭殃的丑恶现  
状，身单力薄的陈晓兰是如何挺身而出不屈不挠继续揭露医疗  
腐败、为患者伸张正义的呢？

## 他与我在一起直至永远

### 小 店 偶 遇

我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团”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的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像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我第二次见到冠华已是四年后的 1971 年暮春。1968 年我在外语学院第二次受冲击，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上书毛主席，没想到主席派了 8341 部队来解决外语学院矛盾。后来到了 1970 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搞外语教改并指示说教改工作结束后要调我到外交部。1971 年 3 月，我在干校接到调令，于 3 月 31 日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分配在亚洲司四处分管南亚次大陆。

就在我调入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从一楼办完事要回四楼办公室。那天上午电梯坏了，大家只好爬楼梯。我刚迈上前厅的大楼梯，抬头看到有一个瘦长个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楼梯把手艰难地一步步往上爬。从背后看他略弯着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这大概是什么领导吧！他的后面有三四个

上楼的部内干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居然谁都不去超越他。我觉得这个“队伍”好奇怪。于是，我抬腿准备跑快几级超过那位吃力地爬楼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认识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说：“别跑！前面是乔部长！”我惊讶地问她：“哪个乔部长？”她说：“外交部还有几个乔部长？乔老爷，乔冠华你还不知道？”我更惊异，我问：“他多大年纪！怎么这样老态？”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其实他也不算老，还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对他打击很大，本来他身体就不大好，这个打击太大，病了一阵，我们都很替他难过，所以谁都不想超过他上楼。跟他打招呼，他要说话，更累。也真不巧，怎么电梯坏了。”我抬头望望那佝偻的身影，心里不禁产生一丝同情。此时，我的身后又压了几个上楼的人，像达成无言的默契一般都静静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三楼部长们办公的那层楼时，冠华略略回过头来，见后面压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带有歉意，抬手向大家致意，勉强笑了一下，但气喘吁吁，神态苍凉。接着他转身慢慢地向自己的办公室去了。这是我到部里之后第一次见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苍老了这么多，真是令人感慨！

### 傲慢与偏见

再后来，我和冠华开始了最初阶段的接触。从现象看那是一段我们性格的冲撞阶段。我一个小科员竟多次顶撞外交部的第二把手领导，这在大机关里是很难容忍的。但我当时刚刚离开学校，确实很不习惯官气很重的政府部门中下级对上级唯唯诺诺的风气。奇怪的是，对于冠华和我来说，这种冲撞恰恰使我们超越了等级的悬殊，年龄的差距，达到了一种共鸣，迸发了初始的朦胧的感情。最初发生的一件使冠华很生气的事是我没有按我父亲的嘱咐把他的著作《柳文指要》送给他。1971年秋，父

亲的这部巨著冲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挠，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终于出版了。在全书著作的过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做了校阅、修正。父亲对他晚年能见到此书问世十分兴奋。他亲笔题字赠送各方朋友，其中有两册送给冠华和姬鹏飞同志。因为我在部里工作，父亲就嘱咐我把这两套书送到两位部长那里。我把书拿到办公室后不觉犹豫起来。那时我已入部半年，对部里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议论他人的习气已有所见所闻。我想如果我把这两部书送给姬、乔两位外交部的最高领导，难免有人会在背后交头接耳，说这是“用她爸爸的书走上层路线”。于是，我叹口气，把父亲的书暂时放在办公室柜子里，等到适当时机再说。岂料日子一长就淡忘了。几个月之后，父亲患感冒住在北京医院。正逢张奚若先生也住院。张奚若是外交学会会长，冠华是副会长。一日，冠华去探望张奚老，言谈中得知父亲也在住院。冠华与父亲早已相识。1949年第一次政协会议前，当时的香港地下党分批组织民主人士回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及开国大典，父亲的那一批正是冠华带队乘苏联轮船经大连到天津再抵北京。一路上他们已很熟悉，解放后他们也常在一起开会。因此当冠华得知父亲住院，就在辞别张奚老之后到父亲病房探望。闲谈之中，父亲问冠华翻阅了他赠送的《柳文指要》没有。冠华愕然，不知父亲所指为何著作。父亲也奇怪，为何冠华未收到赠书。后来，想必冠华对他秘书发了火，因为第二天上午程秘书打电话给我时，语气是很僵硬的。

程秘书问我：“章含之同志，你父亲是否要你送过一套他的著作给乔部长？”

我答：“是有这事。”

程问：“书在哪儿？”

我说：“在我这儿的柜子里。”

程又问：“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送给乔部长？”

我不知如何回答，搪塞说：“没机会。”

程秘书最后很认真严肃地对我说：“请你立刻把书送给乔部长或者送到我这里。以后有这样的事希望你不要耽搁这么久。乔部长很不高兴。他还以为你把书交给我了。”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算了，我马上上来拿，你别走开。”

见到程秘书时，我请他把另一部书顺便代交姬部长。程秘书问我不要“去见见乔部长，直接把书送给他”。我说不必了，我没有别的话要对乔部长说，他在医院里见到我父亲了。

我猜想程秘书把我这种对部长不大在乎的态度报告了冠华。后来，当我们很熟悉之后，有一次程秘书告诉我冠华那次的确很生气。他从父亲病房出来后回到部里去了，一到办公室就把程秘书叫去。

冠华阴沉着脸问他：“章行老有一套书送我的，为什么你不给我？今天我看他，他问我，我一无所知。”

程秘书自然冤枉，说从未见过此书。

冠华忽然记起父亲说是叫“小女代交”的。就问程秘书：

“行老有个女儿在部里？”

程说：“是的，在亚洲司。”

冠华问：“我怎么不知道？来多久了？叫什么名字？”

于是，程秘书就给我打了那个电话。他说以为我会要他引我去见乔部长，没想到我把书给他就算了。后来他给冠华送去书，冠华问他我在哪里。程说在司里，书是他上楼拿的并说我说乔部长已见过我父亲，没有别的话要转达了。当时冠华未再说什么。此后也从未“召见”过我。

但是，他显然没有忘记这个傲慢的“行老的女儿”，并且伺机要挖苦她一下，大概很少有人当时会放弃一个与乔部长见一见的好机会，我没有去见他多少刺了一下他的自尊自大的感觉。不久，他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场合使我很是窘迫。

这年的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这是当时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挥了第一个赴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从代表团的团长、主要成员，一直到翻译人员以及第一个联大发言都由他们两位最高领导审定。团长是冠华，我是代表团翻译之一。当人员确定之后，由冠华主持在部里六层的大会议室召开代表团成立大会。除代表团全体成员外，还有其他部、司两级领导参加。那天下午，我忙着司里一个急件，等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连会议室门口也已有四五位临时搬了椅子来的与会者。我也从旁边国际司的办公室借了张椅子，坐在门外。此时，只听见冠华在里面宣布开会，他简单讲了形势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因为我坐在门外，只听见他的声音，并不见他本人。讲完形势后，冠华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来自部内各个单位，彼此可能还不熟悉，所以互相认识一下。于是，他逐个点名。当叫到我名字时，我在门外站起来，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头。大概当时不少人还不认识我，我听到会场里有交头接耳的声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这个外来者。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进新人。我有点窘迫，赶紧退回座位坐下。岂料此时冠华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儿？”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来，轻声说：“是的。”

冠华并未放过我。他又说：

“就是你扣了行老给我的《柳文指要》？”

会场又是一片耳语声。我不知所措，心里很是生气这位部长如此咄咄逼人，一点小事记得这么牢，叫我当众难堪。最后，冠华说：

“好吧！今天算认识你了。”

我想冠华很快就把这个场面忘记了。后来当我提到这件事

时还耿耿于怀，可冠华说他不记得那是故意的，他只记得那天会上当他第一眼见到我站起来时觉得我很美。我说从那个小文具店开始到这次会上我们俩第一次对视，这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的时间。

以后在我们出席联大会议期间，我和冠华之间又发生了几次冲撞。当我们代表团抵达纽约后不久，爆发了在当时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印巴战争。我当时虽然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但远不能理解压在冠华身上的重担。尽管东、西巴基斯坦这种人为的国家状况长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在我们出发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导致一个国家分裂的地区性战争。年轻的中国代表团进入了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着否决权，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乔冠华团长的姿态。那时我们仓促来到纽约，住在罗斯福旅馆的十四层，没有自己的机要通讯条件，向国内请示只能发明码电报，打普通长途电话。同时，中美关系刚刚开始解冻，在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美国持反对态度，当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的总统乔治·布什曾竭力阻拦决议的通过。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代表团与美国政府的磋商经常不是在两个代表团之间而是在中国代表团领导和基辛格之间。因为自 1971 年夏天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他已成为尼克松政府负责与中国进行最敏感问题谈判的使者。在这场印巴战争中，中美双方的立场是极相近的，双方都竭力想促成停火以免东巴分裂出去后导致苏联势力称霸南亚次大陆。

就在这紧急关口，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决定重新起用资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为副总理兼外长，并立即赶赴纽约促使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当时又为了同一目的来联合国活动。他到达纽约后，刚刚住进彼埃尔饭店就要求会见冠华。本来，我并不担任冠华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我叫去翻译。冠华赶到饭店与布托会

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的情况。由于上午不是我去翻译，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翻清楚。冠华当时很急躁，对着我不耐烦地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辉同志，中国代表团代表）你来帮个忙。”我当时辩解说：“我是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你和吴丹谈什么不是我翻的。”冠华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没有时间听你解释！”我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又觉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团的路上，冠华他们还在紧张地讨论当天晚上的安理会对策，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被“撤职”的年轻女翻译。一直到电梯送我们一行到十四楼，各人回房间时，我的房间与冠华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于是回头对我说：“你也不要闹情绪，多锻炼锻炼就好了。”我觉得这官气十足的“鼓励”实在是一种屈辱，没回答他就转身进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见到冠华时，不知他是否觉得头一天对我太厉害了，于是开玩笑说：“笨猪（Bonjour，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笨猪，还想着昨天的事啊！”我怨气未消，淡淡地说：“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他说：“我的法文发音不好！”我说：“比我的英文好！”

不久之后的一天，联合国大会要表决二十多项提案。代表团决定由符浩同志出席大会投票，我任他的会场翻译。我们议出中国代表团对这二十多项决议的表决态度之后，符浩同志嘱我“请示乔团长”。此时已是午餐时候。当时代表团全体都在二楼一个大餐厅吃饭，只有正、副代表十位领导在十四楼单独就餐，可以同时商议事情。我匆忙吃完饭上楼去请示团长，见他们还刚刚开始用餐。我怕耽误时间就过去问冠华，他是否可以马上看一下我们的投票方案。他可能正热烈地讨论什么事情，回头冲我说：“连顿饭都不让我好好吃！有什么事情吃完饭来不及了？！”我没回答，坐在一边等候。后来觉得看这些领导吃饭别

扭，于是我说：“我到团长的会客室等吧！”冠华未予置理。等了很久，领导们才吃完午餐，冠华走进他的套房，准备进里面卧室休息。我站起来说：“乔团长，可以看看这份方案吗？今天下午要表决。”他一怔，忘记了曾叫我等候。接着很不高兴地对我发脾气说：“你们还让我活不活？连一点点休息时间都不给我！”我一肚子委屈，心想你们这些大人物吃了一个钟点的饭，叫我等你又发火。一下子，我也生气了，把方案往他办公桌上一扔说：“团长爱看不看，反正下午表决，你让程秘书还我好了。”说完跑出他的套房，回到房间就趴在床上哭起来了。那时和我同住一屋的是北京医院护士小倪。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回北京就申请回学校教书去。这外交部的官衙门，我受不了那份气！当了官，干吗脾气那么大，小干部就该是受气包！”过了一会儿，程秘书拿着方案找我来了，说乔部长看完了。他劝我不要闹情绪，乔部长担子重，难免急躁，大家要体谅他。后来，符浩同志知道了，又对我说：中央要老乔这次来出席联大，任务那么艰巨，他很累；又说老乔心情也不好，他的夫人刚去世不久。符浩说老乔应该再找个伴侣，不然他的生活太苦了。我从来都是个很容易动感情，同情别人不幸的人，听了符浩同志一番话，我觉得也许团长也需要理解，那些怄气的事就算了。

从联大回国后，由于我在亚洲司，不属冠华所管，因此也就很少接触。转眼到了1972年的8月，联大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中央为了协调各友好国家的关系，派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东欧司的有关同志陪他去罗、阿两国后，回乌鲁木齐休息两天，由当时的亚洲司副司长叶成章和我从北京去乌鲁木齐会合后陪同冠华去巴基斯坦。东欧司的同志在新疆等我们回来后同机回京。

中午，我和老叶到乌鲁木齐。下午向冠华汇报后，大家一起晚餐。那天，冠华喝了很多茅台，饭后他又邀众人在大厅里喝

茶，他似乎很兴奋。谈话中不记得是谁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 1967 年时冠华被红卫兵抓去的事。冠华似乎一下子被激怒起来，猛然转头对我说：“都是你们整的！你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把我和老姬抓去，关在地下室，又关到你们学校！总理指示放人，要我们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对我！”我当时被他这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着我。后来，我也生气了，我说：“乔部长，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人！我又没造过你的反。我也挨过整，我们‘红旗大队’是保你们的，保‘陈、姬、乔’，你怎么乱冤枉人！”谁知冠华更火了，他说：“你们‘红旗大队’也是造反派！我亲眼看到外交部 15 号门外的斗大标语‘打倒乔冠华’是署名‘北外红旗大队’。你们和‘造反团’都是要打倒我的！”我试图向他解释红旗大队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 8 月 7 日讲话后怕处于被动，想抛出乔，保住陈、姬，因为乔在反右倾中受过处分，有把柄。但“红旗大队”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冠华武断地说：“我不听这些，反正你们都是造反派！”其他人看见我和部长争执，都对我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不干，凭什么给我扣帽子？那晚真是不欢而散。我觉得这个部长这么烈的性子，很难在他下面工作。但另一方面，我却并不厌恶他，我有种好胜心想叫他知道我不是轻易可以被权势压倒的。我觉得这个乔部长这样才气横溢，也许他是个诗人李白那样的性格。但可惜他是个大官，因而这种性格变成了盛气凌人的官气，使人无法忍受。

### 心 的 感 应

没料到，我和冠华关系的转折竟也在这次出访。我们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同布托和他们的外长会谈。第二天下午谈判

结束，准备次日乘专机回乌鲁木齐。晚上，我和叶成章同志整理完会谈记录，要让冠华审阅后交使馆发回国内。老叶要我拿去给冠华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辞。

我们住在拉瓦尔品第的洲际旅馆。冠华住的是个很大的套间。我推门进外屋时，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已是夜间，屋内灯光很暗。客厅的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伊斯兰风格的圆形彩色大吊灯悬在屋子中间，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清真寺油画，屋内点缀着许多浓烈的热带鲜花和散发着幽香的兰花。吊灯下的圆桌上有个硕大的水果篮子，里面盛满了南亚特产的各种鲜果。房间的主人显然还未动过其中任何一样，因为水果篮外面的透明漂亮包装和绿白相间的缎带都尚未拆开。这时的客厅里只亮着沙发旁的一盏桌灯，在这足有五六十平方米大的房间里，一盏孤灯散发着幽黄色的亮光，照着那画中的清真寺和那淡淡的蓝色墙壁，一切都显得那样朦胧，那样忧郁，很容易勾起人内心的伤感。在这幽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冠华独坐在长沙发的一端，此时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他静静地坐着，似在沉思，似在幻想，又可能是在回忆。我突然从心底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忧伤。冠华也不急于问我有什么事，他似乎还未从那梦境中走出来。他指指桌灯边的小沙发，说：“坐吧！”我坐下，递给他我整理的记录，轻声地说等他看完了我再来拿。他把记录随手放在沙发上，却慢慢地对我说：“不忙，坐一坐吧！”屋内那样静谧，我们谁都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冠华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他又说：“如果我得罪过谁，你都对他们说我很可怜，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说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被他脸上那无限的惆怅打动了，一种同情、一种理解触动着我。我觉得那作为部长的乔冠华只是他天天必须